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研究综述

高怡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30日

摘要

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成都平原的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 出土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祭祀区出土的金器因其独特性和重要性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整理有关研究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 总结学者从制作工艺、审美特征及宗教信仰等维度对金沙遗址金器的研究, 以及将金沙遗址置于古蜀文明的视野下, 与三星堆进行联系和对比的学术成果, 对研究情况进行初步的概括。

关键词

金沙遗址, 金器, 古蜀文明, 综述

A Review of Studies on Gold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Jinsha Site

Yihan G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May 29,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July 30, 2026

Abstract

The Jinsha Site in Chengdu is another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n the Chengdu Plain following the Sanxingdui Site, from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have been unearthed. Among them, the gold artifacts discovered in the sacrificial area have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ecause of their uniqueness and significance.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gold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Jinsha Sit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cholarly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ligious beliefs. It also review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at place the Jinsha Sit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studies comparing and connecting Jinsha with Sanxingdui.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vides a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gold artifacts from the Jinsha Site.

Keywords

Jinsha Site, Gold Artifacts,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Re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成都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东南部，地处成都市区西部青羊区金沙村和金牛区黄忠村，东距市中心约 5 公里。遗址的东南面是十二桥商周遗址群，东北约 8 公里处为羊子山土台遗址，北约 38 公里是广汉三星堆遗址。2001 年在金沙村出土大批遗物，由此开始进行大规模发掘。遗址内含大型建筑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和墓地等。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金沙遗址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蜀国都邑，属十二桥文化，同时与三星堆文化有紧密的传承关系[1]。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金器大多出土于“梅苑”遗址中的祭祀区。

金器在古蜀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体现出古蜀人民的审美特点和宗教信仰，通过金器的制作工艺能够推断金沙遗址的工业发展水平，不同遗址之间器物的相似与差异也能体现出遗址之间的影响和传承关系。因此，金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汇总专家学者对金沙遗址出土金器在技术、审美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金沙遗址出土金器提供较为系统的材料。

本文认为，当前金沙遗址金器研究呈现出“艺术史与符号学解释强、科技考古与工艺溯源弱”的不平衡态势。大量研究集中于对纹饰的文化和宗教解读，对金器的原料来源、合金成分、微痕工艺、制作序列等基础科学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这一失衡导致许多关键问题(如技术源流是本土创新还是外来传播、不同器物之间是否存在分工体系等)长期停留在推测层面。未来研究的突破点在于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引入材料科学与实验考古方法，系统解决原料产地、工艺链复原及使用痕迹等问题。本文在梳理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上述不平衡态势，对各研究领域的进展与不足进行比较评述。

本文以“金沙遗址”“金器”“古蜀文明”“黄金制品”等为主要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维普网等学术期刊数据库中进行系统检索，并对《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四川文物》等核心期刊进行了重点阅读与分析，同时参考了相关考古发掘报告与学术专著。

2.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的考古发现

2.1. 金沙遗址概况

金沙遗址是 21 世纪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成都平原继三星堆遗址之后的又一处商周时期的重要聚落。金沙遗址经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数十年的考古工作，现在所知的遗址范围约三万平方米。

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1995 年~2000 年)，此时对金沙遗址范围内的三处地点进行了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命名为黄忠村遗址。出土有大量陶器并发现有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判断为典型的十二桥文化遗址，但当时并未认识到这是一处都邑规模的大型遗址。第二阶段为 2001 年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至 2011 年，是金沙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阶段。2001 年，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金沙村施工时，发掘出大量的玉石器、铜器和象牙遗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对“梅苑”“兰苑”“体育公园”和房产开发区等地进行了全面的文物勘探和发掘。其中,“梅苑”东北部发现有大量象牙、铜器和玉石器,绝大多数金器也出土于该地。推测该区域应与宗教仪式活动相关[2]。第三阶段为考古发现的整理期,对考古发掘出土内容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出版有相关的书籍和发掘报告[3]。

2.2. 金器出土概况

从公开发表的成都金沙遗址考古报告、考古发掘简报中,统计得出金沙遗址出土金器 288 件。以金片、金箔为主。采用锤揲、剪切、刻划、模冲、镂空和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依据平面形态差异可分为几何形器、像生形器、其他形器 3 类。几何形器中又可分为多边形器和圆形器,多边形器包括三角形器、菱形金箔、条形饰和鱼纹带等。而圆形器包括“四鸟绕日”金箔饰、圆形金箔饰等。像生形器中可分为人物形器和动物形器,人物形器中包括金面具和人面形器,动物形器中包括蛙形饰和鱼形金箔饰。其他形器中有喇叭形器、“几”字形器和金器残片等。其中大多数金器都出土不止一件,呈现出数量大,形制多样化的特点[3]。

3.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的研究现状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物质遗存,展现了古蜀人民精湛的工艺技术,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信仰。相关研究围绕其制作技艺、审美特征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探讨。

3.1. 制作技术与工艺

黄金作为人类较早使用的金属之一,质料柔软,无法制造实用的兵器或工具。但由于其本身的美观珍贵和延展的特性,主要用于装饰美观方面,体现财富和权力,并作为一般等价物来使用。对于出土金器的研究,除了分析金器体现的审美和文化价值以外,金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包括化学成分、原料来源和铸造技术,同样是值得研究的主题。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均为金薄片或金箔且工艺为热锻成型。金箔的制作称为“锤揲”,即利用黄金质料柔软和延展性强的特点,反复锤锻制成[4]。张天恩在《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中,对比各古代遗址出土金器的时间后,发现古蜀文明的金器以三星堆一号坑最早,而年代又晚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岗等出土金叶片的遗址。因此认为古蜀文明的金器制作工艺很可能是从中原传来,但古蜀文明的金器制作并非是对中原地区的简单模仿,其金器在纹饰制作和粘贴工艺等方面都对中原地区都有所超越[5]。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的制作工艺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很多器物为锤揲制成的金箔且都带有纹饰,而中原地区出土的大多为素面金饰。不过目前仍无法了解古蜀文化高超的金器制作工艺是在中原的工艺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结果还是受其他文化传统的影响。本文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做出单向传播的结论。中原地区早期金器多为素面,而古蜀金器普遍带有复杂纹饰,这种差异既可能是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创新,也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功能需求与社会价值观念。

由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很多都是附着于其他器物之上的,所以粘贴技术盛行。肖璘等通过对金沙金器的无损成分分析、金相检验和显微观察,获得了关键数据:金器含金量 83.3%~94.2%、含银量 5.1%~16.4%、含铜量 0.2%~1.6%,波动较大且无人工合金迹象,表明原料为自然金;金箔组织为等轴晶和孪晶,系热锻成形,厚度多在 0.1~0.2 毫米;纹饰为刻划形成,镂空系反复刻划切割而成,多数器物表面未经抛光。这些结论为金沙金器的原料属性、成形工艺和纹饰制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也指出刻划工具、抛光介质和原料来源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4]。在对早期中国的黄金制品进行研究时,安志敏先生也提到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并论及原料来源和制作工艺。提出金沙遗址时期的金器原料应该是依赖于自然黄金的采集和砂金的淘洗,但是否开始开掘原生矿床目前仍未知[6]。目前,对金沙金器热加工温度、

刻划工具材质及表面抛光材料的科学分析仍属空白,工艺源流问题的解决有待更多科技考古数据的支撑。

3.2. 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金器大多为不能独立使用的金片或金箔,附着于其他器物上使用,作为装饰,体现出古蜀人民独特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对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的器型设计和装饰纹样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古蜀文明在视觉层面上的符号表达。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以薄片化、抽象化为显著特征,器型多为扁平片状。表面光滑无繁饰,整体风格简练。

金人面像为黄金制作的人头像的面部装饰,整体锤揲成型,成型时应垫有模具。出土后嘴部残缺,脸部具有一定的写实风格。是否是贴于青铜人像上还有待商榷。段渝认为古蜀文明的金面具可能吸收了西亚地区的文化因素,并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反映了古蜀文明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7]。

四鸟绕日金箔饰为圆形薄片,内外双层镂空设计,外层四鸟逆时针环绕,内层十二道放射状芒纹。采用锤揲工艺,纹饰采用刻划技术,应是反复刻划而成。出土于祭祀区,可能贴附于红色漆器上,内层就像旋转的火球,体现崇拜太阳的习俗[8]。黄剑华认为该文物体现了古蜀文明的崇日观念和群体认同意识[9]。

刘道军认为四鸟绕日金箔饰的环形构图与动态平衡体现了古蜀艺术对“循环”与“秩序”的美学追求,造型达到了虚与实、动与静的对立统一,具有和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同时还提出此物件可能映射早期古蜀文明的历法观念的观点,具体体现在飞鸟和太阳芒纹的数量上,数量分别是4和12,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内层的12道漩涡状光芒代表一年十二个月[10]。这一解释颇具想象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商周时期古蜀是否已有精确的十二月历法尚无直接证据;其二,器物上数量与自然周期的对应关系可能是巧合,而非有意识的设计;其三,目前未见其他古蜀遗物提供类似的历法符号系统。因此,该观点应视为一种推测性假说,有待多学科交叉验证。相比之下,将其理解为太阳崇拜与鸟崇拜的视觉表达,因有大量民族志和考古类比支撑,更具说服力。

也有学者从藏文化的视角解读黄金面具和四鸟绕日金箔饰,认为太阳神鸟所体现的内容似乎与古藏人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观有关,都是空间时间观和宇宙本体观的表达。并由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联想到西藏地区出土的金面具,将其与古藏人的丧葬习俗联系起来。体现不同时空下的相似的文化追求。虽然对比有些不严谨,但为金沙遗址的研究注入一丝民族色彩[11]。

金器纹样不仅是审美的载体,更体现出古蜀文明宇宙观、社会结构与信仰体系。在纹样设计方面,古蜀人显示出了高超的审美意识,例如金冠带,其上的纹样生动具体,通过动态构图象征“尊鸟射鱼”的信仰仪式,纹样线条的流畅性与节奏感体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力。黄剑华在与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对比后认为,其他文化中出现的变体纹样(如人面鱼纹)并非理性思考后表达的方式,而是先民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情感抒发的形式。相比较而言,古蜀文化中的图像不仅有复杂的意蕴和情感,还体现了熟练的艺术手法和高超的表现技巧,更注重理性化的符号系统构建[12]。

3.3. 宗教信仰和权力象征

金器虽以装饰功能为主,但其形制和用途与祭祀场景高度契合,基本上都是用作祭祀仪式。金器在古蜀人民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文明的信仰形式主要为自然崇拜,如太阳崇拜、蛙崇拜和鸟崇拜等。自然崇拜通常被视为一种早期的宗教形式,涉及对自然现象(如太阳、月亮、动物)的神圣化。

如四鸟绕日金箔饰,蕴含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10]。体现出早期神鸟崇拜和太阳崇拜,并且,在三星堆遗址和其他遗存中也发现有关于太阳崇拜的现象,体现古代文明的精神文化信

仰在某种程度上的共通。崇日作为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又一次论证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之间紧密的联系[9]。

金冠带中的金射鱼纹带，呈等宽窄圆圈形，直径上大下小，出土时断裂为长方形。器物为锤揲成型，纹饰采用錾刻与刻划相结合的工艺，主要使用錾刻工艺。表面錾刻四组相同图案——箭簇贯穿鱼、鸟，辅以圆圈符号，线条流畅，动态感强。有学者认为是戴在头上的金冠。并且应有其他质地的东西衬托，其尊鸟射鱼的图案体现出鲜明的信仰和价值取向。黄剑华认为此器物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反映出强烈的崇日意识，崇鸟观念，群体认同意识以及权力象征意义。箭射鱼鸟的构图可能隐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鸟纹或代表古蜀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鱼纹则象征着与之结盟或被支配的水域社群[12]。

金蛙形饰呈片状抽象造型，凸目鼓腹，锤揲成片形后采用切割工艺，边缘切割粗糙。纹饰采用錾刻工艺。古蜀文明中的蛙崇拜具体体现在蛙型金箔上，蛙崇拜主要包括祭蛙求雨、生殖崇拜和月中神话。屈小玲通过对蛙形金箔与蛙崇拜源流进行探究，展示了古蜀文明在蛙崇拜南传中发挥的作用。并认为古蜀蛙崇拜可能通过民族迁徙向南传播，与东南亚铜鼓蛙纹存在潜在联系，但传播路径尚待考古证据填补[13]。黄剑华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发现，从流传的神话传说这一角度同时结合了其他文化考古材料中的蛙纹图案，论述了蛙纹的丰富含义。体现出此器物应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祭祀器物，对古蜀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12]。

蛙崇拜并不只局限于古蜀地区，其他早期文明都有蛙崇拜的影子，如马家窑的彩陶蛙纹。蛙形金箔的使用场景和数量仍有待研究，有学者认为其应嵌贴于木质或皮质载体上，作为祭祀法器的装饰部件[10]。但出土时未见附着物痕迹，功能推测需更多考古发现的支持[14]。

4.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与古蜀文明及三星堆遗址关系的研究

位于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出土的物品种类丰富且有一定的特殊性，将此遗址与相距不远的三星堆遗址联系比较，将其放入由相同考古资料所构建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利于从宏观的角度更合理地认识此遗址[15]。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都位于成都平原，且为商周时期古蜀国的中心遗址。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出土的同类器物有一定传承性和连续性，但同时也有独特的发展特点。金沙遗址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地[1]。

施劲松在比较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遗物时发现，金沙遗址的少数遗物表明三星堆时期的信仰在金沙时期依然存在，如金冠饰上的纹饰与三星堆金杖相同，具有相似的含义。三星堆遗址2号坑出土的器物如青铜太阳形器突出反映太阳崇拜信仰。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饰也体现了鲜明的太阳崇拜信仰。金沙祭祀区出土遗物仍然突出了权力，以及崇拜太阳的信仰，延续了三堆文化的传统。而那些只见于三星堆器物坑的器类，可能因某种原因而未在金沙延续下来[15]。对比两遗址同类器物，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普遍小于三星堆金器，原因可能为金器所附器物较小[15]。

张天恩认为，三星堆祭祀坑的金面罩等刻镂纹饰的边缘多显毛糙，轮廓不够规整，技术尚欠成熟。而金沙遗址的刻镂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四鸟绕日饰的纹饰图案生动，线条流畅，边缘分明，刻镂精细，表明金沙遗址的工艺水平相比于三星堆时期有所提高[5]。

与同一时代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址相比，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都有集中发现的黄金制品。并且在工艺技术方面显示出进步性。在纹饰制作和金箔粘贴方面都对中原地区有所超越。北方和中原地区的金器中大部分器物上未见纹饰，即使出现纹饰，工艺也不甚先进。但古蜀政权的遗址中出土的金器器物中有不少带有纹饰图案，与北方和中原地区早期金器均呈素面无纹有明显差别。并且其上的纹饰表明已掌握

镌刻、模冲和刻镂工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器中,有部分器物上有使用贴金工艺的痕迹,虽未有直接的考古证据,但金箔的形制表明粘贴是最恰当的形式[5]。然而在段渝看来,技术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发展程度的高低,而是体现出黄金制品在南北系统中具有功能差异,南方的文明例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将金器赋予很高的地位,在三星堆文化中,金杖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在商文化中,青铜器“九鼎”象征国家最高权力。同一时期南北方之间黄金制品的功能差异实质是文明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的差异[7]。

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探究两遗址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认识,促进古蜀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5. 结语

金沙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内涵,为探索早期古蜀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遗址中出土金器 200 余件,样式精美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锤揲、镌刻等精湛工艺和太阳神鸟、金冠带上的精美纹样,展现了古蜀人将自然崇拜与权力象征相融合。对于研究古蜀文明的技术工艺、审美习惯和宗教信仰具有重大作用。相较于中原金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等古蜀金器更注重装饰性与仪式功能。金沙遗址中部分器物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但同时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回顾二十余年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当前金沙金器研究呈现出“艺术史与符号学解释强、科技考古与工艺溯源弱”的不平衡态势:大量成果集中于纹饰的文化解读与宗教意涵的阐发,而对金器原料来源、合金成分、微痕工艺、制作序列等基础科学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导致技术源流、工艺传承、功能使用等关键问题长期停留在推测层面。有鉴于此,未来研究应着力推进多学科交叉,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系统集成成都平原及周边河流的砂金样本,通过铅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对比分析以确定金料来源。以三星堆-金沙-十二桥文化为时间轴线,建立金器器类、纹饰与工艺的类型学演变序列。结合祭祀区内金器的出土位置与共出器物组合,并利用微痕检测残留有机质,以推断金箔的实际粘贴方式与使用场景。将金沙金器置于欧亚草原-中原-西南夷的黄金制品传播网络中进行系统比较,检验“中原传播说”“西亚影响说”“本地起源说”等不同假说的解释力。通过上述实证导向的议程推进,金沙金器研究有望从以符号解读为主转向阐释与实证并重,从而更深入地揭示古蜀文明的技术成就、社会结构与信仰体系,并进一步明确其在早期中国文明网络中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

- [1] 朱章义, 张擎, 王方.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J]. 四川文物, 2002(2): 3-10+97-98.
- [2] 朱章义, 王方, 张擎. 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J]. 文物, 2004(4): 4-65+97-100+3.
- [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 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 [4] 肖璘, 杨军昌, 韩汝玢.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实验分析与研究[J]. 文物, 2004(4): 78-89+97.
- [5] 张天恩. 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J]. 考古与文物, 2007(5): 53-56.
- [6] 安志敏, 安家瑗. 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J]. 考古学报, 2008(3): 291-310+415-416.
- [7] 段渝. 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J]. 考古与文物, 2004(2): 33-42+99.
- [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9] 黄剑华. 太阳神鸟的绝唱——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饰探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4(1): 130-134.
- [10] 刘道军. 从金沙“太阳神鸟”看金沙遗址文化[J]. 青海民族研究, 2007(1): 165-171.
- [11] 同美, 益卓.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太阳神鸟黄金面具青铜立人的藏文化解读[J]. 民族学刊, 2018, 9(3): 65-72+117-119.

- [12] 黄剑华. 金沙遗址金冠带图案探析[J]. 文博, 2004(1): 46-50.
- [13] 屈小玲. 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0(4): 70-75.
- [14] 黄剑华. 金沙遗址出土金蛙之寓意探析[J]. 东南文化, 2004(1): 46-51.
- [15] 施劲松.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J]. 考古学报, 2011(2): 183-212.